

# 王完白与孤岛时期上海重整道德运动<sup>\*</sup>

王 森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对日伪殖民统治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基督徒也面临同样问题。与积极抵抗的爱国者或是卖国投敌的汉奸不同,上海一些中国基督徒发起重整道德运动,力图依靠基督教信仰来提高个人和社会道德水准,借此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王完白和其同道在上海利用租界内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和宣传重整道德运动。他们借助英美力量,使得重整道德运动在租界内盛行一时。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消失,这一运动也由公开的大规模对外宣传转向小团体活动,并逐渐趋于沉寂。上海重整道德运动反映了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对战时宗教徒社会活动和心态的影响,战时中国基督徒活动和心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王完白 孤岛 重整道德运动 基督徒

近年来,抗战史研究中愈加重视对社会史的探讨,战时沦陷区民众社会生活和心态成为学界关注的新兴焦点。<sup>①</sup> 沦陷区的中国人以何种姿态面对日本占领者? 在传统的爱国抵抗和卖国投敌二元道德论模式下,这一问题被简化为汉奸和爱国者。傅葆石在其关于战时上海文人的经典著作中提出了第三种模式:隐退。他认为在沦陷区除了汉奸和爱国者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不抵抗、不卖国的文人,用隐退的方式来回应日本侵略者。<sup>②</sup>

此前关于沦陷区研究多集中在政治人物和世俗群体,而对于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的讨论相对较少。近代以来,基督教信仰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沦陷区基督徒的活动成为观察这一关系的绝佳场景。邢福增研究了珍珠港事变后的华北教会,认为沦陷区教会人士对日本侵略者可以分为合作和抵抗两条道路。华北中华基督教团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接受控制和改造,而王明道则以基督教信仰为武器抵抗日本侵略者。<sup>③</sup> 与这两者的选择均有所不同,以王完白为代表的部分上海基督徒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积极地组织重整道德运动来改造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用宗教来回应政治。而在珍珠港事变后,则又和傅

\*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

① 江沛、迟晓静:《国内抗战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5—2006》,《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2—249页。

② 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③ 邢福增:《王明道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沦陷时期教会人士抵抗与合作的个案研究》,邢福增:《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版,第103—174页。

葆石所论的上海文人相似,处于退隐的状态。可以说他们所持的是不卖国、不抵抗的不合作立场。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后方,而沦陷区教会研究则可述之处尚多。<sup>①</sup> 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沦陷区中国基督徒的活动,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专文论述。本文将焦点放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的上海,以孤岛时期一名医生王完白为中心,探寻中国基督徒在此一时期的心境和活动。限于材料,本文以重建史实为主,更多个案对比研究和综合论述,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王完白(1884—?),民国时期著名医生。1884年4月2日生于浙江绍兴。<sup>②</sup> 其父王从谦,为当地著名牧师。王从谦原来笃信佛教,其妹亦信佛教,童贞出家为尼。1898年,西方传教士在王从谦家对面开设教堂。王从谦与王完白父子两人一同与传教士辩论教义,数月后父子同信基督教,后从谦妹也还俗而信教。<sup>③</sup>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王完白从常州前往上海避难,此后一直在沪悬壶济世。来到上海后,王完白在同窗周邦俊所开设的沪上著名的中西大药房坐诊,同时受周之邀在其药房所办中西电台主讲卫生知识和宣传基督教。因为播音效果良好,在上海著名基督徒赵晋卿、李观森、李登辉、谢颂羔等人支持下,建立了专门宣传基督教的福音广播电台,台址设在广学会大楼。上海福音广播电台为当时全球唯一一家以宣传基督教为己任的电台,曾引起相当轰动。<sup>④</sup> 王完白为福音广播电台总经理,此后其除了在药房坐诊,主要将精力投入到电台日常运营,并负责《福音广播季刊》的编辑和发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沪战打响,上海也卷入战火,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上海基督教会为救济难民而组织了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该委员会有委员150余人,王完白负责医疗救护,积极投身到救济难民活动中。<sup>⑤</sup> 在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为了避免日本人所设广播监督处的登记要求,福音电台由美国传教士向美国领事登记。王完白在战争初期救济难民的行为可以归结于人道主义,而拒绝向日本方面登记表明他决心与日本侵略者彻底划清界限。王完白这一坚决不合作的立场为其此后的社会活动埋下了伏笔。

此时,王完白不但是福音电台的总经理,而且还担任上海民营无线电播音业同业公会主席。在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于1939年初发起的播音募捐中,王完白代表播音界广播。他引用《圣经》文字劝人捐款救济灾民,称“施比受更为有福”。<sup>⑥</sup> 事实上,王完白并不是随意地引用基督教的经典。与此前只是在福音电台播音相比,王完白正随着时局的发展而力图更加深入、广泛的宣传基督教,其所借助的则是正席卷世界的重整道德运动。

① 王森:《国内外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研究概述》,《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6期,第105—110页。

② 王完白传记资料分别见张丹子编:《中国名人年鉴·上海之部1943》,中国名人年鉴社1944年版,第199页;李元信编:《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中国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年版,第222页。

③ 王完白:《我的父亲》,《伉俪月刊》1946年第4期,线装书局2007年影印《伉俪月刊》第2册,第353—355页。

④ 王完白:《本电台成立之经过》,《福音广播季刊》第2卷第2期(1937年10—12月份),第14页。关于上海福音广播电台的研究有Michael A. Krysko, *American Radio in China: International Encounters with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s, 1919—41*,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1)一书第5章;艾红红、朱丽丽:《民国时期基督教广播特色初探》,《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104—109页。

⑤ 《基督教联合会非常服务》,《申报》,1937年9月5日,第6版。

⑥ 《市民组劝募委会继续推进劝募工作》,《申报》,1939年1月3日,第9版。

## 二

重整道德运动(Moral Re-Armament,简称MRA)原名牛津团契运动(Oxford Group),由美国路德宗牧师弗兰克·卜克门(Frank N. D. Buchman,当时译作弗兰克·卜克满)于1921年在牛津大学发起,主要是通过小团体的团契活动,寻求灵性的纯洁和道德的提升,以改变家庭生活和外部世界。其有四大标准: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牛津团契不是由教会发起,也不追求建立教会,而是希望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生活来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进而改造社会。<sup>①</sup>由于牛津团契宣称通过改造人的道德来改变社会,极力反对使用武力和战争,与当时欧美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相呼应。因而这一运动很快就由英国传向全世界,进入中国而得到追捧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很多教会和基督徒学生推崇牛津团契。抗战前夕,蒋介石夫妇在伦敦牛津团契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称“国家再造之实验,系于国民道德之本质……牛津团依个人忠诚无私之颠扑不破纯朴基础,再造社会之号召,实为一种耶教革命之号召”。<sup>②</sup>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赵紫宸对这一运动曾有精辟的评论:“当此世界经济困难,群众失业,各国竞加军备,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色彩鲜明,互相争峙的时代,民众生活烦闷,正需一种发挥精神,寄托命脉的势力以扶植辅导之。团运(指牛津团契——引者注)之来,适遇其会。可以说时势呼召出团运来。”<sup>③</sup>

上海的牛津团契是由原上海青年会总干事汤仁熙从美国引入的。他于1929年12月在美国接触并接受此一运动,回国即在上海推动牛津团契。<sup>④</sup>王完白应是到上海后接受了牛津团契,并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而刁信德、刁庆欢、李清茂、曹方涛等沪上名医师也先后参加。其他参加团契的著名基督徒还有李观森、赵晋卿、李登辉等人。除了中国人以外,也有一些在华传教士和驻华外国军人参加活动,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组织。<sup>⑤</sup>抗战前,上海牛津团契是小范围内的团体聚会,经常聚会的地点在愚园路刁信德和王完白家中,并出版有《团契生活》杂志。王完白利用自己在福音广播电台播音之便,经常讲解牛津团契,很多人因听了广播而参加活动。<sup>⑥</sup>

1938年6月4日,卜克门在伦敦广播,改牛津团契为重整道德。<sup>⑦</sup>由于当时欧洲各国整军备战,局势紧张,卜氏呼吁和平的主张甚得人心,得到英美政界人士普遍响应。因而重整道德运动迅速在欧美推广,并在瑞士召开第一届世界重整道德运动大会,美国总统罗斯福、荷兰女王威廉明娜、蒋介石均去电表示赞成。原本属小团体的活动变成为公开推广的大规模运动,在世界各国掀起宣传活动。<sup>⑧</sup>不过,上海牛津团契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自己的活动名称,直到1939年4月仍然自称为上海牛津团。<sup>⑨</sup>当然,他们已经有意识地通过一般杂志介绍团契的内容和意义,这样公开的宣传在

① 明灯报社编译:《牛津团契是什么》,上海广学会1935年版。霍华德著,罗时宝译:《弗兰克·卜克满与道德重整运动》,正中书局1948年版。

② 《蒋委员长夫妇撰文寄赠牛津团新刊物》,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6日,第3版。

③ 赵紫宸:《现代信仰的学说与实践:牛津团体运动》,《真理与生命》1934年第1期,第16页。赵紫宸于1933年在英国与牛津团契成员有直接接触,但他本人并没有成为团员,且对牛津团契的社会效力持怀疑态度。

④ 汤仁熙:《我的生命如何改变》,《生命》第1期,1941年1月,第14页。明灯报社编译:《牛津团契是什么》,“小言”,第1页。

⑤ F. R. Millican, “Oxford Group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 - 193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7), p. 92; 《牛津团寒假曾去津》,《燕京新闻》第4卷第10期,1938年2月7日。

⑥ 王完白编:《见证如云:无线电听众之自述》,“绪言”,广协书局1940年版,第1页(上海图书馆藏,感谢中国传媒大学艾红教授指点该书所在)。

⑦ 卜氏演讲中文稿见《道德的重整》,《真光》第38卷第1期,1939年1月,第8—10页。

⑧ 《国际道德运动在美开会》,《申报》,1939年6月23日,第9版。

⑨ 上海牛津团:《牛津团契运动》,《西风》第32期,1939年4月,第124—129页。

《申报》上也曾出现,专门载文解释重整道德运动四项标准。<sup>①</sup>6月底,上海重整道德运动代表动身前往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重整道德运动大会。

1939年7月至8月,重整道德运动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第二次世界大会,与会代表1500余人,来自30个国家。中国代表有汤仁熙、王完白、刁信德、汤铭和(汤仁熙之子)、邓淑媛、蔡文浩、梅立德(Frank R. Millican)、梅立德夫人(Aimee B. Millican)、都礼华(M. Gardner Tewksbury)等人。<sup>②</sup>大会之前有筹备会议,会后则有宣传训练会议,大会主题是“新人”、“新国家”、“新世界”。当时已返回美国的前汉口圣公会主教吴德施(L. H. Roots)积极推动此运动,其女儿露芝(Francis Roots)则在筹备会议上与中国代表有深入接触。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重整道德运动的意义与中国儒家传统格致修齐平天下相同,“深信我国民族之团结,社会之改造,难民之救济,以及数千万人之流离奔走,各种问题,均可于此重振道德运动获其答案。吾人此来,亦欲追随欧美各国先进之后,训练成为革新世界先锋队之一员”。<sup>③</sup>类似的话王完白在两年前就说过,“以革新道德为首要,能以基督教所力行之至诚、纯洁、无私、博爱四者为新生活之标准,然后方可达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目的,亦所以解决各个人生问题之唯一救法”。<sup>④</sup>两种表述均论证了代表基督教精神的重整道德运动与中国儒家传统相契合,通过道德的提升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这种从道德层面改革社会的理念是重整道德运动的核心,也是其深得社会各界人士赞同的原因。蒋介石夫妇为大会发来的贺电就称“深信此种重振道德运动,必能揭发各民族与举凡有思想的个人之天赋的良知良能”。<sup>⑤</sup>与蒋介石夫妇持有同样的心情,王完白也表示参加世界重整道德运动大会后“不只以个人改变,或家庭改变为满足……去改变社会,拯救世界。但不是单用口去传讲,却是要在生活上见证出来”<sup>⑥</sup>,王完白意识到可以通过重整道德运动来宣传基督教和改变社会。

### 三

返回上海后,汤仁熙、王完白、刁信德等人随即开始筹划大规模宣传重整道德运动。1939年9月27日,他们在江西路都城大饭店举行宣传大会,到会者200余人,重要来宾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中国教会领袖刘廷芳、上海巨商张嘉甫,外国人则有仁济医院福开森夫妇、吴德施的儿子罗根夫妇、农业家斐伦。因参加者西方人居多,故整个大会均用英语。大会主席为随同王完白等人从美国而来的澳洲重整道德运动代表柯白克。在中外人士宣讲重整道德运动意义后,全场同声歌唱重整道德运动歌曲“先锋队歌”,气氛相当热烈。最后是“王完白、刁信德、汤仁熙三人报告最近之经验,及今后之远象与计划”。<sup>⑦</sup>

① 《如何精神自信——至诚(二)》,《申报》,1939年5月30日,第13版;《如何精神自信——纯洁(三)》,《申报》,1939年6月1日,第17版;《如何精神自信——无私》,《申报》,1939年6月3日,第21版;《如何精神自信——仁爱(五)》,《申报》,1939年6月5日,第14版。

② 与会中国代表人数说法不一,代表之一的蔡文浩当时记述为14人(蔡文浩:《从第二次世界重整道德大会归来》,《学徒之友》第1卷第1期,1939年12月,第8页),而1949年后则回忆说是8人(蔡文浩:《回忆“道德重整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5页),梅立德夫人则称有10人(Aimee B. Millican, “The Second World Assembl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70, 1939, Oct, p. 587),《申报》则说有12人(《重整道德运动代表团昨返沪》,《申报》,1939年9月20日,第11版),上述名单系综合各说而列。

③ 《世界新兴势力重振道德运动》,《申报》,1939年8月15日,第7版。

④ 王完白:《前奏曲:何以专讲基督教》,《福音广播季刊》第1卷第4期,1937年4—6月,第1页。

⑤ 《世界新兴势力重振道德运动》,《申报》,1939年8月15日,第7版。

⑥ 王完白:《我的宗教经验》,《伉俪月刊》1947年第9期,《伉俪月刊》影印版第2册,第889页。

⑦ 《重整道德运动在沪盛大集会》,《申报》,1939年9月28日,第9版。

由于重整道德运动的核心人物都与福音广播电台有着密切关系,而广播又是战时环境下成本较低的宣传方式,因而福音广播电台成为重整道德运动推广的首选平台。10月9日,福音广播电台举行重整道德运动特别播音。播音者为汤铭和、沪江大学教授胡祖荫、学生王恒忍、之江大学学生葛家良及周庆声等7人。播音者或为大学教授,或为大学生,播音的目的是号召沪市学生“皆能参加重整道德运动,接受基督至诚、纯洁、大公无私、博爱四个标准,以完成‘新人’‘新国家’‘新世界’之使命”。<sup>①</sup>

重整道德运动的宣传高潮在12月初达到顶点,当时卜克门号召全世界重整道德运动在12月1—3日发起宣传活动,要使1亿人“听从上帝以获得胜利之生活”。上海重整道德运动响应此一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首先是在中文的《申报》、《新闻报》和英文的《中美日报》刊文介绍重整道德运动的意义与最近消息,并刊登大幅广告;其次是出动大量工作队散发特刊《大众月刊》和《我怎样开始》等各种小册子,同时在各大商店张贴重整道德的标语,在电影院放映幻灯;而最重要的则是无线电播音和公开演讲,“每日中午十二时三刻至一时半在东方电台(周波一二二零),晚七时至八时在福音电台(周波七六零),分青年、教育、职业、医学、家庭、教会六大单位(每日一单位),向听众述说经验,以解答听众生活上之问题”。<sup>②</sup>

11月30日晚,首先由仁济医院的福开森在福音广播电台播音了卜克门名为“世界危机中之曙光”演讲词。卜氏的演讲词曾在美国、荷兰的电台播送过,极受欢迎。其表示“重整道德,要吾人去除自私观念,消灭偏执成见,不分国族,不分党派,共于上帝管理之下,充实道德力量,建筑新社会世界”,而根本标准则是重整道德运动高悬的四个标准“至诚、纯洁、无私、博爱”。<sup>③</sup>

12月1日下午,王完白与全家人在东方电台播音,讲述其家庭之内重整道德之后的生活情形。晚上则是在福音广播电台,由沪江大学教授金武周及大中小学生轮流演讲,“根据各人生活经验,阐发重整道德对于教育及青年之重要”,号召青年“必须认清当今困难所在,勿一任感情之冲动,而必须知过改过推己及人。而今日教育亦必须以训练道德人才为职责,培植良好青年,作开辟世界新园地之先锋”。<sup>④</sup>同一天的《申报》上刊有重整道德运动的广告,打出“你是受什么所支配的,金钱?欲望?舆论?还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至诚、纯洁、无私、博爱”,提醒人们准时收听东方和福音两电台的广播。<sup>⑤</sup>12月2日的广播则是关于职业和商业道德,“由本市职业界中人,有商人、医生、律师、洋行职员等。各就其从自身重整道德而改变其所处环境之经过,阐述重整商业道德之重要”,强调个人道德重于金钱。<sup>⑥</sup>在这一天的《申报》上刊登了一长篇宣传文章介绍重整道德运动在中国的情况,强调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该运动的支持,并论述重整道德运动与中国儒家传统契合之处,同时还举例说明人们在参加重整道德后的积极行动和有益的社会功效。<sup>⑦</sup>

12月3日,除了继续在东方和福音电台播送关于青年、家庭、教会三组专题外,还播送了当时英国著名网球名将奥斯汀支持重整道德运动的演说。当天晚上,他们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举行大会。大会从下午5时开始,除了散发重整道德运动的宣传品和小册子,与会者还一起合唱重整道

① 《重整道德运动播音演讲》,《申报》,1939年10月10日,第13版。

② 《沪市明日起推行重整道德运动》,《申报》,1939年11月30日,第7版;蔡文浩:《回忆“重整道德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170页。《我怎样开始》为介绍如何展开重整道德的小册子,共10页,由Hallen Viney著、杨富森译,上海五洲书报社1939年3月印。

③ 《重整道德运动播音世界危机中之曙光》,《申报》,1939年12月1日,第10版。

④ 《推行重整道德运动特别播音第一日》,《申报》,1939年12月2日,第10版。

⑤ 《重整道德》(广告),《申报》,1939年12月2日,第4版。

⑥ 《重整商业道德》,《申报》,1939年12月3日,第10版。

⑦ 《重整道德运动在中国》(上),《申报》,1939年12月3日,第10版。下篇亦是长文,刊于《申报》,1939年12月5日,第8版。

德运动歌曲。同时与会者也相互交流彼此对运动的理解和生活经验,由王完白、汤铭和、汤仁熙、刁信德分别主持。<sup>①</sup>在重整道德运动规定的三日特别播音结束后,每周四和每周六继续在福音电台播音,每天下午都在东方电台播音15分钟。

从9月至12月,上海重整道德运动发起的连续宣传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申报》在10月16日发表社论,对重整道德运动的内容和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虽然重整道德运动由基督教会发起,但是其意义超越宗教、国家、种族、阶级之范畴,与中国传统伦理及蒋介石之新生活运动意义相契合,希望“重整道德运动者之身体力行而收切实伟大之效验!”<sup>②</sup>曾受邀参加重整道德运动大会的《西风》杂志编辑,也认为“这至少是一个不坏的运动。对于这种重振道德的运动,我们是没有加以反对的理由的”。<sup>③</sup>正是因为当时上海处于日军占领之下,恐怖暴力横行、道德沦丧的社会背景下,重整道德运动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当时上海各团体于同期发起了“崇尚廉耻”运动,强调改变社会风尚、维护民族正气,展开连续宣传活动。<sup>④</sup>虽然目前看来这一“崇尚廉耻”运动与重整道德运动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说明了当时社会道德问题得到了上海各界的普遍关注,因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对于普通人来说,道德问题涉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因为物价高涨总是被与奸商的无耻联系起来。一位妇女号召全上海的妇女同胞行动起来,呼应重整道德运动,大到不让亲人做汉奸走狗小至不提高商品物价,而不是为了自己享乐鼓励父兄做丧尽天良的事情,让人指责“孤岛上的妇女都是醉生梦死”。<sup>⑤</sup>而一家制药厂主办的内部刊物上,也连续刊登文章讨论重整道德运动。<sup>⑥</sup>

但是,重整道德运动宣称依靠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可以达到改变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实现改造世界的宏伟目标,达至“新人”“新国家”“新世界”的完美社会,在当时日本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上海物价飞涨、暴力事件不断的现实情况下,多少显得曲高和寡、不切实际。就在9月26日重整道德运动发起第一次大规模集会后,《申报》“自由谈”就刊文指出其用意良好,但在此乱世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近二三年来,道德早经扫地;抢掠者固然无视于道德,遭难者复不能获得世人道德的援助。从此,横理胜于公理,弱肉强食,几成为很合法的事”,并举上海商人的无耻贪财为例来证明重整道德是对牛弹琴,唯一能改变现实的是“根据道德,而拟制新的合法的法律,以实力为执行法律的后盾,则大者若抢掠屠杀,小者如操纵渔利,均得受严厉的法律制裁。一切恶劣的倾向,自然渐可归于消灭”。<sup>⑦</sup>前引《西风》杂志在承认重整道德是不坏的同时,也认为其虽然有利于个人道德提升和家庭生活,但是对于复杂的社会来说,重整道德显得并不那么有效。而设在上海具有中共背景的《学习半月刊》则将重整道德运动视为奇谈怪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剥削下层工人和劳苦大众的手段,只不过是精神麻醉而已。<sup>⑧</sup>

如果说重整道德运动在道义和目的上是深得人心的,那么其受到的质疑就在于当时的社会环

① 《重整道德运动人士昨晚举行盛会》,《申报》,1939年12月4日,第8版;《重整道德运动继续播音》,《申报》,1939年12月5日,第8版。

② 《社评:重整道德运动》,《申报》,1939年10月16日,第4版。

③ 《西风》编辑室:《重振道德运动》,《西风》第39期,1939年11月,第73页。

④ 《本市各团体发起崇尚廉耻运动》,《申报》,1939年10月17日,第9版。

⑤ 一读者:《重整道德运动》,《上海妇女》1939年第12期,第18页。

⑥ 毓书:《谈重整道德》,上海新亚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编:《新亚半月刊》第33期,1939年12月15日,第1版;黎青:《重整道德之感言》,《新亚半月刊》第37期,1940年2月15日,第1版。

⑦ 柳浪:《从重整道德谈起》,《申报》,1939年9月29日,第13版。

⑧ 庶人:《谈谈重整道德运动》,《学习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39年12月16日,第154—155页。同期的慕蕙《所谓“重整道德运动”》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对其进行分析。

境下,重整道德是否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社会,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宣传上。1939年12月底,王完白和刁信德联合其他医师发起了取消医师处方酬劳的行动。在他们发给各大药房的通函中提到当时物价高涨,而他们身为社会一分子理应作出应有贡献,“自从各国倡导‘重整道德’以来,鉴于基督绝对之至诚、纯洁、无私、博爱四端,更觉相差太远,抱愧无地……为减轻病家困苦起见,谨请贵处对于敝人等所有药方X光与查验等酬劳款项,自二十九年元旦起,祈予一律取消”。<sup>①</sup>虽然各大药房遵照执行,其原因更多的在于沪上著名医生联合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由于道德重整运动本身的影响。动荡不安的时局,始终是王完白和重整道德运动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 四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相对安全的地方。王完白家住愚园路123号,位于法租界内,其日常出诊和经营福音电台也是在租界内,重整道德运动也多在租界里进行,因而个人安全是有保障的。不过,随着日本与英美关系的逐渐恶化,日军在租界内的活动也愈加猖獗,英美的保护作用也逐渐失效。

1939年,日本在占领区内掀起反英运动,上海也有波及。1939年春季刊的《福音广播季刊》中就被夹带了反英传单,福音电台不得不在刊首发出声明,以正视听。<sup>②</sup>在12月初重整道德运动特别宣传活动中,王完白老友周邦俊的中西大药房也积极参与其中,其所属的中西广播电台也相配合,宣传重整道德运动。但是,由于福音广播电台是向美国方面注册而没有向日本人的无线电监督处登记,因而日本人以中西广播电台和中西大药房在报上投稿宣传重整道德运动为由,命令中西广播电台停止播音。<sup>③</sup>尽管福音广播电台因属于美国产业而未受冲击,但是日本人对电台的控制却愈加严密。早在10月,日本人就对美国对华短波广播讯号进行了干扰。<sup>④</sup>从1940年4月开始,日本人对美商华美电台(呼号XMHA,周波600)不断进行干扰,而福音电台(呼号XMHD,当时周波为760)也被波及,听众无法正常收听。尽管电台方面和美国领事馆不断抗议,甚至引发外交风波,被舆论称为“无线电波战”,但是日本人始终不断对这两个电台进行干扰。

在经历了1939年底重整道德运动的宣传高潮后,这一运动也逐渐回归了之前牛津团契的小群体聚会。1940年5月,远东各国重整道德大会在缅甸仰光举行。上海方面派出了梅立德、汤铭和及饶锡生三人为代表。<sup>⑤</sup>作为重整道德运动中年轻一辈的得力干将,汤铭和在参加完缅甸大会后,于1941年到重庆而后并没有返回上海。<sup>⑥</sup>此后在公开活动中,重整道德运动再无特别重大宣传。王完白本人则依旧在药房出诊和福音电台广播,并仍然是重整道德运动核心,且曾发表声明维护重整道德的名誉,要求一名为“中国重整道德会”的组织勿借用重整道德的名义举办遗拾服务。<sup>⑦</sup>

① 《医师本道德立场自动取消处方酬劳》,《申报》,1939年12月31日,第10版。

② 竺规身:《前奏》,《福音广播季刊》第4卷第2—4期合刊,1939年夏秋冬季,第2页。

③ 《工部局警务处关于广播监督处命令中西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的报告(1939年12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等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④ 《日妨碍美国播音,日方表示态度》,《申报》,1939年10月8日,第10版。

⑤ 《重整道德大会在仰光举行》,《申报》,1940年4月21日,第9版;《远东各国一致赞助重整道德》,《申报》,1940年4月24日,第10版。

⑥ 陈荃生:《回忆清心堂早期发展史》,《南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上海市南市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1990年编印,第101页。

⑦ 《重整道德会遗拾服务》,《申报》,1940年11月13日,第8版;《道德重整运动阐明立场》,《申报》,1940年11月18日,第9版。

从1940年12月8日开始,福音电台在每星期六下午6时半至7时半,专设一名为“空中信箱”的栏目,专门解答听众对重整道德运动的疑问。<sup>①</sup>当时重整道德运动的活动主要分为四种:文字,报章刊物的文字工作和中外书报的互相翻译;播音,在福音电台每周四和周六的中英文播音;通函,与国内外各埠通信并交换刊物;集会,公开集会和家庭团契及小组谈话。

1941年1月29日,重整道德运动举行联谊大会,在此前两天则先开训练会。此次联谊会还是在银行公会大楼举行,由团契契友及亲友参加,人数约百人。首先由汤仁熙致辞,随后是10位契友讲述个人见证和生活经历,最后由王完白主讲重整道德运动的意义。<sup>②</sup>这次活动虽然为期3天,但只是团员联谊活动,并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宣传。之所以再无如之前规模盛大的宣传活动,经费固然是重要原因,而随着日美关系不断恶化,社会局势不稳定才是最大的障碍。

王完白坚持推进重整道德运动和宣传基督教的另一努力是创办了《生命》杂志。《生命》创刊于1941年1月,王完白为主编。该刊为双月刊,除前两期相隔三个月,其他各期虽有延迟,但基本上能按期出版。目前笔者见到的为前9期,最后一期出版于1942年6月。<sup>③</sup>王完白在创刊号中说道:“我们每个人所有的生命,现在如何活动,将来如何归束,也更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借以说明刊物的主旨为了探究生命的目的,他引用圣约翰的话作为回答“人有了基督,就有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sup>④</sup>从第4期开始,则将“显示生活方法,解答人生问题”作为口号列在封面。从各期文章内容和作者来看,该刊基本上是重整道德运动的机关刊物,如第4期主要围绕工商道德的理论和经验,第7期则为团契生活专号,第8期实业生活专号讲商业道德,第9期为家庭生活号。各期均有关于重整道德运动的文字。而文章作者或译者大多是运动的中坚力量,如王完白、汤仁熙、刁信德、曹芳涛等。除了重整道德运动的文章外,《生命》也经常报道福音广播电台的消息,如电台节目简表,介绍电台栏目,转载电台播音讲稿等。

然而,此时太平洋上空已经是战云密布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日本军队进占租界,全面接收英美在华产业。同一天,福音电台被日本人接管,停止播音,电台设备为日本人所占用。<sup>⑤</sup>尽管《生命》还在坚持出版,并于1942年2月出了团契生活专号。但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下,重整道德运动的坚持更多的是靠个人和小团体的默默信守,而不能指望大众的响应。就在珍珠港事变爆发的前夕,王完白多年好友也是重整道德运动核心人物刁信德的孙子被人绑架。<sup>⑥</sup>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一度封锁。王完白连日常到四马路中西大药房出诊都无法进行,只能在家中坐诊。<sup>⑦</sup>尽管“各国人民在错综复杂的今日,彼此接触,时常感觉到左右为难”,但是王完白依然坚守“若要世界大同,必须先培养着这种基督的精神。但不能期待着别人来做,乃是要先从我做起。由个人到家庭,及服务的机关,先能和爱而合作,这样就会影响到社会国家,以至世界”。<sup>⑧</sup>他在1943年还坚持到赵主教路教堂主讲卫生知识。<sup>⑨</sup>

① 王太和:《别开生面的空中信箱》,《生命》第1期,1941年1月,第21—22页。

② 柏锦恢:《春节联谊大会缩影》,《生命》第2期,1941年4月,第7—8页。

③ 据当事人回忆该杂志为重整道德运动原来所办的《团契生活》改刊而来,参见蔡文浩《回忆“重整道德运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163页。

④ 王完白:《开场白》,《生命》第1期,1941年1月,第3页。

⑤ 《〈新申报〉关于日军报道部与宪兵队接收从事敌宣传广播电台的报道》,《福音广播电台为请求归还机件恢复播音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公函》(1945年10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等编:《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第407、526—527页。

⑥ 《刁信德之孙昨被绑》,《申报》,1941年12月3日,第9版。

⑦ 《医学博士王完白启事》(广告),《申报》,1942年3月8日,第4版。

⑧ 王完白:《团契生活》,《生命》第7期,1942年2月,第1页。

⑨ 《王完白医师》(广告),《申报》,1943年12月20日,第3版。



## 五

综观上海重整道德运动的兴起、高潮和衰落,以王完白为核心的运动领导者均避免与日伪当局有接触,拒绝接受侵略者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宗教信仰回应政治变动。如果从传统的抗敌爱国与通敌卖国的二元论来看,王完白和其同道的行为很显然是不符合人人奋起抗战的时代要求。然而从沦陷区实际情况来说,王完白和其他基督徒的不抗争、不通敌的不合作立场显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抉择。在沦陷区进行抵抗,只能采用秘密和地下组织的形式,对于基督徒来说成本和代价很高。上海重整道德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是在上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一旦有反日活动,牵连甚广。但他们也拒绝和日本人合作,福音电台在上海沦陷后拒绝向日本人登记,汤仁熙的儿子汤铭和在1941年从缅甸转道去后方的重庆,重整道德运动宣传活动引发的外交风波,凡此种种,均可看出运动领导人对日本人拒绝合作的态度。

当然,上海重整道德运动是利用了珍珠港事变前租界特殊的政治形势,上海重整道德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一部分中国基督徒在战争状态下,改造家庭生活和重建社会秩序的良好愿望和尝试。这一运动之所以能够推行,除了国际重整道德运动的推动和租界内相对安全的环境外,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中国人心灵的伤害也是重要因素。而基督教会不但能够提供一定的保护和救济,基督教信仰在战时也具有心理疗伤作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战时中国民众的需要。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教信仰是在战争环境下,唯一可以实现自身救赎和拯救人类社会的方式。<sup>①</sup>因而,王完白和其同道才会不遗余力地推动重整道德运动,宣传基督教。

但是,从重整道德运动推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其社会影响力并不大,参与其中的多是上海教会内的基督徒,局限在小圈子内的部分人,很难得到饱受战火影响的社会大众呼应。整个运动更多的是停留在各种宣传活动和理念推广,并无多少实际可行的措施,没有真正起到改变社会、挽救人心的社会效用。大规模的对外宣传固然能够风行一时,掀起一阵热潮,却很难持久,更不用奢谈改造社会了。其难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也不难归纳,在中日激烈交战的动荡时局和上海混乱的社会秩序下,主张改造个人生活、提升道德水准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当然,就基督徒个人来说,战争环境下国家认同与宗教信仰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中国基督徒在战时对此一问题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在后方的陈崇桂也同样经历了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激烈斗争。<sup>②</sup>基督徒向何处去是那个时代很多基督教信仰者心头最大的问题。<sup>③</sup>对此一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作者王淼,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王完白:《改变人生可以改变世界》,《生命》第2期,1941年4月,第3—5页。

② 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第4章,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版。

③ 李逢初:《基督徒到那里去?》,同心社1940年印。